

# 关于工人队伍基本状况的调查

一九七三年八月

## 说 明

这个调查材料共分两个部分，分别反映了上钢一厂和上棉三十一厂工人队伍的状况，重点是青年工人的状况。

两个厂的调查都说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刚从初中毕业的知识青年，富有朝气，要求学习，进步很快，许多人进厂不久就能熟练地掌握操作技术，一批优秀的青年已经入党入团，有的已经分别担任党、团支部书记和班组长的领导职务，是一批很有希望的革命和生产的骨干力量。此外，经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在落实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以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精神面貌也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

调查材料反映了工厂党组织在组织青年工人开展技术学习和关心青年健康等方面的经验和问题。

参加这两个厂调查的，有复旦大学文科师生，还有《文汇报》记者和一部分理论工作干部。

## (一)上海第一钢铁厂

- 一、第二转炉车间五十六个“海塘青年”的情况调查
- 二、钢板车间青年工人情况调查
- 三、钢板车间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情况
- 四、如何做好犯错误的人的转化工作

## 一、第二转炉车间五十六个“海塘青年”的情况调查

上钢一厂第二转炉车间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建立起来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视察过的车间。这个车间有五十六个工人是参加过海塘劳动以后进厂的，大家称他们为“海塘青年”。这些青年经过十四年的锻炼，目前大多数已成为车间里政治上和技术上的骨干力量。他们的成长过程，为我们教育培养刚从学校里出来的新一代青年工人，提供了一些经验。

### 从海塘到工厂

这些青年绝大多数是五七届初中毕业生，没有考上高中。一九五八年三月，响应市委“知识青年修建奉贤海塘”的号召，参加围塘劳动。这些青年的家庭出身，工人、贫下中农四十六人，摊贩、职员、中农五人，小业主、资本家五人。这些青年，特别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青年，在参加海塘劳动中表现比较积极。

刚到海塘，天气还比较冷，他们顶寒风，冒大雨，挑灯夜战，连续苦干，经受了很好的考验。现在，有些同志回想起这

一段斗争生活时，还满怀深情地说：“海塘锻炼实在好，时间不长意义大，锻炼身体炼红心。”一九五八年六月，他们在大办钢铁的大跃进形势下，进入了上钢一厂。

### 三方面的教育

这些海塘青年在谈到自己成长过程时，都认为父母、师傅、党团组织的教育非常重要。

父母的翻身教育。不少青年都有一部苦难的家史，他们通过父母的忆苦思甜，有翻身感，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海塘青年刘其仁还不满两岁，父亲因为还不起阎王债，把他卖给富农当养子。不久，母亲也被流氓恶霸拐卖。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一家团圆，过着幸福的生活。海塘青年赵超说：“要不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我哪能读完初中进工厂回想小时候吃豆饼豆渣的生活，越想越觉得新社会的甜。”

师傅的纪律教育。这些青年刚进厂时，年轻贪玩。当时分配在化铁炉上的胡建义等四个人，进厂第三天，夜班做到半夜两点钟，人不见了，到处找也找不到，急坏了炉长徐道亮师傅。一直到拂晓五点多钟，这四个小青年来了，笑嘻嘻地对徐师傅说：“我们在平炉车间看出钢，真有力！”徐师傅听了又气又好笑，严肃地批评了他们，指出钢铁工人遵守劳动纪律的重要性，还用两种社会、两种学徒制度的对比，向他们进行阶

级教育。这些小青年觉悟提高后，表现都很好。另有一个青年柳紫峰，在驾驶行车时，闭目养神，结果造成行车上三吨重的主钩坠落，险些造成重大事故。老师傅帮助他对这次事故进行分析，教育了小柳和其他青年。从此，小柳接受教训，十几年来注意安全行车，并且多次消灭了重大事故隐患。有一次，吊包子浇钢，小柳发觉领行车工把龙门架顶在钢水包轴心上，立即采取措施，防止了一场翻钢水包的重大事故。

党团组织的路线教育和阶级教育。这些青年刚进厂时，厂里的生产条件比较差，手工操作多，劳动强度高。炼钢又是争分夺秒的紧张战斗，在炼钢炉前，稍不留意，就会碰伤、烫伤，出事故。当时有些人担心，“生活这样紧张，是否吃得消”，也有的怕“烫坏了脸孔，找不到对象”。党团组织就通过各种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特别是厂里每年举行的毛主席来厂视察的纪念活动，对大家的教育很深。海塘青年唐正义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来看我们钢铁工人，使我懂得了为革命炼钢最光荣，做毛泽东时代钢铁工人最幸福。”他们牢记毛主席“要好好干，大有可为”的教导，决心在毛主席视察过的车间里干一辈子革命。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党团组织经常开展青年突击队活动，对他们思想觉悟的提高促进很大。那时，转炉生产刚刚上马，技术水平低，炉龄短，炼不上十炉、二十炉，炉子就坏了。为

了解决拆炉工作繁重和人手不足的矛盾，青年突击队员在下班后，经常参加拆炉战斗。当“保钢”战斗最紧张的时刻，许多海塘青年往往连续三、四个月不回家，每天干上十几小时。党团组织还特地组织干部和青年突击队员到当时劳动条件最差的制砖房去劳动。制砖房是制造沥青砖的，为了防止腐蚀，脸上手上要涂上厚厚一层油。通过这些艰苦劳动的锻炼，使青年们树立起“越是艰苦越光荣”的思想。许多海塘青年自豪地说：“我们是经过大跃进考验的钢铁工人。”

## 政治表现

在这五十六名海塘青年中，曾经有三十人参加过共青团，其中十二人入了党，十一人正在积极争取入党。目前担任正副党支部书记的四人（其中一人最近调厂部工作），担任工长、总工长、值班副主任的六人，担任炉长和组长的十三人，担任车间干部的六人，共二十九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二。

这些青年的政治表现，大体上可分为好的、比较好的和差的三类：

第一类好的，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投入批修整风运动，能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站稳立场。这一类有十六人，占总人数百分之二十八点五。总工长周念邦，进厂后政治上进步快，两次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见到了毛主席。

一九六〇年，买不到《毛泽东选集》，他迫切要求学习，就向别人借阅。一九六一年，刘少奇一伙刮起大砍大杀转炉炼钢的黑风，他敢于同工人老师傅一起，顶妖风，战恶浪，抱着“毛主席视察过的车间一分一秒不能停产”的坚强决心，主动地挑起重担，把炼钒渣中倒出来的低温铁水炼成钢。一九六三年，他组织全组同志学习《毛泽东选集》。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刮起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有人动员他领四百九十六元的“补发工资”，还说什么：“历史上革命斗争都是从经济斗争开始。”周念邦说：“不对！同资本家可以进行经济斗争，现在毛主席掌权，你们拿的是人民的钞票。”他还动员其他工人不拿这种所谓“补发工资”。一九六八年，周念邦同一些工人去支援昆明钢厂建设，回上海时，沿途有武斗，为了旅途安全，别的同志决定乘飞机，周念邦则坚持财政制度，并且说服大家退掉飞机票，改乘火车回来。

第二类比较好的，拥护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完成生产任务。这一类有三十七人，占总人数百分之六十六。行车组长周炳炎，技术好，肯钻研，还积极组织大家学马列著作，但他斗争性不强，怕得罪人。许林海，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政治上表现消沉，据他自己讲：“进厂不久，就打过入团报告，但事后没有下文，团组织没有找我谈过，民兵也不让参加。想找对象，人家晓得我这张底牌也就离得远远

的了。”言毕，摇头不止。

第三类差的，主要是那些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目前还缺乏认识的人，有三个人，占百分之五。王耀祖，在小学读书时当过少先队中队副，进厂初期担任过团支委，当过化铁炉青年炉长。一九六〇年受过团区委表扬，登过报，大照片登在光荣榜上。但他的父亲是伪乡长，有血债，一九六二年病亡狱中。当时，他把反革命父亲的画像供在家里，并穿起白鞋，以尽“孝”道；同时还向别人吹嘘“我父亲还是个大八腊子”，“我小辰光冬天还能吃到西瓜”等，这说明他在思想上还不能同反动阶级划清界线。在他年龄超过二十五岁时（当时担任团支委工作），团总支动员他退团，他表示不满。“一打三反”运动中，发现他在一九六九年二月的日记中有革命烈士诗抄中摘录的诗一首：“黎明之前黑暗，黑暗之中混乱。世上总有阳光，黑暗毕竟很短。”同年六月又在车间里写黄色诗句，给另一生活作风不好的女青年看。

## 技术状况

经过十四年的劳动实践，许多海塘青年已经成为生产技术的骨干，其中先后担任过炉长和组长的有二十八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

一九五八年，钢铁生产发展很快，技术工人十分缺乏，有

些未满师的徒弟也被推上基层生产领导岗位。六个海塘青年进厂不满一年，也先后担任炉长或组长。他们挑起班组领导担子后，下苦功学习技术，工作搞得很出色。

目前在这个车间的炉前、铸钢、行车、鼓风四个部门工作的海塘青年共有二十八人，其中担任各级领导工作的十六人，占总人数百分之六十。现在他们一般都熟练地掌握了生产技术。杨耀祥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个青年因有三百度近视，戴眼镜操作不便，不戴又看不清。开始他不安心炉前操作，多次要求调动工作。党团组织对他进行教育，特别是当他听了老工人控诉日本帝国主义靠五百万吨钢侵略中国的罪行，很受教育；当他认识了毛主席关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伟大号召的意义，又很受鼓舞，从此，他下定决心要在炼钢岗位上作出贡献。他刚当上炉长，有一次，由于技术不过硬，脱氧不完全，引起大沸腾，烧毁了钢包车。从此以后，就更加虚心向老师傅请教，买炼钢书籍看，到兄弟班组去学习，技术水平提高较快。有一次炼三号钢，取样化验合格，但是，他根据操作经验判断，却认为不合标准，继续加石灰吹炼。事后证明，确是化验室分析错误。象这样的事，以后又发生好几次。在车间“炉前办学”中，杨耀祥还担任工人讲师。

## 经济状况

这些青年的工资原来分四等：一级半工（四十五元）三人，二级工（四十九元）三十人，二级半工（五十三元）十八人，三级工（五十七元）五人。另外，还有一个已经调离本车间的蒋瑞强曾评为三级半工（六十二元），与最低的一级半工相差十七元。

最近，部分工人调整工资后，二级半工和相当二级半工的，只有三人，三级工和相当三级工的增为五十二人，另有一人，因犯错误正在处理，没有参加评级。三个二级半工是：陆大益、柳紫峰、赵超，他们有以下几种情况：

陆大益，车工组长，因学徒期间患肺结核，病假半年，延期一年转正，刚好碰上一九六三年工调，按规定不能评级，因此，比别人低半级。但是，另一海塘青年史新才，虽然连续七年病假，至今没有上班，但因他参加了一九六三年工调，提了级，这次工调又不把病假作为评级条件，因此工资就比陆大益高。

柳紫峰，行车副组长，一九六三年工调时，因他在不久前出过行车事故，没有提级，工资一直比其他同志低。另一海塘青年刘其仁，近年来连续发生两次漏钢包事故和一次砸伤人事故，但不影响这次工调，他提级后，工资比柳紫峰高。

赵超，海塘青年中工资最低。原因是他从一九六二年底起担任了厂校教师，工资标准按文教系统，这次工调虽增加工资四元，调整为五十一元，但比同年进厂的工人低六元，比同年进厂当干部的海塘青年低四元。赵对这次工调还是比较满意的，他和爱人这次共增加工资收入十八元，现在，一家四口（两个孩子），九十元工资，生活过得很好，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次工调，是白开水里加糖，甜得很。”但是他对继续当教师有想法，因为目前已比工人工资低六元，奖金低一元，担心：“下次再搞工调，按文教系统标准加一级只有四元，而工人加一级有九元，差距越来越大。”他还担心夫妇两人都是教师，会影响孩子的家庭出身。文化大革命中，他下放在电工组劳动后，最近虽经多次动员，仍不愿回厂校当教师。

经过最近一次工调，这些海塘青年按家庭人口计算的平均收入是：十五元的四人，十六元至二十元的十五人，二十一元至二十五元的十九人，二十六元至三十元的九人，三十元以上的九人。多数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特点是。

(1) 双职工多。已婚的五十五人，其中，爱人也是职工的四十六人，其余九人的爱人，五人是里弄工，三人是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一人是农场工人。她们每月的一般收入水平，里弄工二十元左右，农场工二十七元，市区职工在三十元至五十元之间。通过这次工调，双职工收入增加较多。

(2) 家庭就业人口多，特别是一家几口（指成人）都是职工，都有工资收入，家庭经济比较富裕，有七人。如：史康年，全家五口（孩子两人），本人工资五十七元，爱人工资四十七元，母领退休工资六十三元，加上附加工资，每月收入一百七十七元，按人口平均收入每人三十五元。

(3) 孩子少的多。在已婚海塘青年中，有一个孩子的九人，有二个孩子的二十八人，有三个孩子的十五人，有四个孩子的二人，无孩子的一人。但是，这些工人的年纪还轻，平均年龄只有三十三点七岁，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已有十七人，占三分之一，子女人数已显得偏高。

## 二、钢板车间青年工人情况调查

钢板车间是一九七一年新建的一个车间，是全厂技术设备最先进、青年工人最多的一个车间。三十岁以下的青工有六百四十七人，占车间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

这些青工的来源：部队复员的一百五十八人；六六至六八届中学毕业生、经过农村劳动锻炼的知识青年一百九十二人，七〇、七二届初中毕业直接分配来厂的知识青年一百九十八人；还有九十九人是从别的车间调来的。

他们的家庭出身：工人三百四十六人，贫下中农五十八人，职员八十六人，小业主及其他九十九人，资产阶级三十人，还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二十八人。

他们的文化程度：大专毕业的十三人，高中毕业的五十四人，初中毕业的五百八十人。

他们中间，党员三十三人，团员二百三十二人。有五十一人分别担任车间、工段党政工团的领导职务。

这些青年工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显著提高，在批林整风和生产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有些青年有冷热病，高兴时拼

命干，不高兴时“攒纱帽”；喜欢听表扬，听不进批评意见，有时明知做错了事，如果领导上对他们的批评重了一点，说理稍不恰当，往往顶牛，不买帐。

钢板车间党、团支部在教育、培养青年工人的工作中，做了不少工作，有经验，也存在一些问题。

### 积极地为青年的成长创造条件

推上去。把青年有意识地推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第一线，让他们在风口浪尖上得到锻炼。复员军人穆克勇，在部队施工中，几次坍方，他都不顾个人安危抢救战友。来厂后，在生产上不怕苦，不怕累，表现积极。但他政治要求不迫切，开会打瞌睡；写转正小结拖拖拉拉，还说：“写不写，反正三十六只老洋。”后来，党、团支部有意识地把他推到阶级斗争第一线，让他参加批林整风的各项活动，如：写大批判稿，在批林会上带头发言。在一次救火战斗中，他脸部烧伤后，仍坚持顽强战斗，受到了同志们的赞扬。去年十二月他参加了共青团，并担任了生产小组副组长，表现很积极。

但是，也有一些积极要求上进的青年，领导上没有让他们到斗争第一线去经受锻炼，因而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复员军人曹中禹，进厂后，工作积极，在青年中有一定威信，大家选他为团支委，团支书想让他负责政宣工作。但有的工段领导却



认为政宣工作很重要，担心他挑不起这个担子，没有同意。以后，又指责他对团的工作不积极，不热心。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抱着“生产工作好好干，团的工作放一边”的态度，表现有点消极。

压担子。有意识地让青年在各种工作岗位上挑重担，使他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增长才干。团总支副书记姚慧英，一九六七年进厂，在平炉车间当开炉门工，任团支部副书记。调来钢板车间后，车间党总支看到她有活动能力，就让她负责民兵、青年等方面工作。去年四月，又让她担任团总支副书记。当时，乙班团支委闹不团结，对团总支工作意见也较多。党总支决定让小姚去处理这个矛盾，一面鼓励她敢于负责，一面帮助她研究工作方法。她到了乙班后，与团支委谈心，主动检查了工作缺点，启发大家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帮助团支部委员消除隔阂，加强团结，小姚也得到了锻炼，进步很快。去年十一月，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但是，也有一些青年往往因为领导对他们的一些问题处理不当，使他们长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操纵工戴锦陶，家庭出身工人，六六届初中毕业生，一九六八年到崇明农场，工作一贯积极，任过副连长，写过入党报告。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进厂后，即任新工人学习班班长，有一定组织能力，在群众中有威信。团的总支、支部成立时，群众分别推选她为委员候选

人，但由于领导上考虑不周，没有让她当选。这件事引起群众议论：“小戴是不是犯了错误？”她也感到压力很大，领导又未及时找她谈心。八月间，党支部宣布小戴担任生产组长。不久，又因工作需要，调去搞“工调”，并指定另一同志暂代组长，可是，当她搞完“工调”回到小组时，领导从未提起此事，使她感到好象组长又被撤了。现在，领导虽然仍认为她是骨干，但实际上并未给她什么工作做。

带上路。老师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否正确，对于青年都会带来直接的影响。甲班有个青年，有一次丢了钥匙，被一个犯过投机贩卖错误的师傅拾到藏起来了。当青年找钥匙时，这个师傅就说：你要钥匙，就得拿点“刺激”来。为了急于开锁，这位青年只得去买香烟、糖果去“刺激”他。老师傅的错误做法，给青年们带来很不好的影响。此后，这个组里藏东西、要“刺激”成了风，吓得有些青年不敢再把东西放在更衣室里了。党总支发现了这个问题，认为这是老师傅究竟把青年往什么路上带的问题。就发动老工人讨论：应当怎样以身作则，把工人阶级的好思想、好作风、好传统传给青年。现在，大多数老工人都自觉地通过身教和言教，把青年带好。例如：丙班团小组长汤志勤，感到自己年纪轻，做家庭访问工作有顾虑。老师傅钱德章了解这个情况后，就带着他一起到青工家里进行访问，一起找青年谈心。通过这样的活动，小汤逐渐取得

了工作经验，提高了工作信心。现在，他已能主动深入青年群众中做思想工作，进步很快。

### 对中间、落后青年要热情关怀，正确领导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通过批林整风，车间党支部对中间、后进青年，注意多做耐心教育工作，正确引导，使这一批为数众多的青年的积极因素得以调动，不少青年进步较快。但是，也有一些同志只看他们的消极一面，看不到他们的主流和本质，总认为“只有整一整才能解决问题。”下面就是车间领导在教育中间、落后青年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

例一：董鹏明，七〇届初中毕业生，在学校里就是有名的“小荡”。进工厂后，唱黄色歌曲，打群架，生产上屡出操作事故。虽经多次批评教育，仍无转变，成为车间里有名的“三老”（老检讨、老不改、老再犯），群众对他是“三气”（看他行为生气、听他名字惹气、做他工作泄气）。车间领导也曾想将他开除出厂了事，还两次打报告要求把他送去劳动教养。通过这次批林整风，党支部进一步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增强了教育青年的责任感，开始对董鹏明犯错误的原因进行调查分析，了解到他小时由于经常挨父亲打骂，因而成天在外游荡，交上了坏朋友，开始沾染上流氓阿飞习气。党支部决心改进工作作风，由党支书亲自带他到骨干力量比较强的升火

组劳动。到了这个小组，老师傅热情欢迎，经常找他谈心，到他家里访问，和他母亲配合进行教育，还让他到阶级斗争第一线去，同坏人坏事作斗争。他在党支部和老师傅的启发教育下，揭发了一个“惯窃”。当他稍有进步表现，党支部又立即对他进行表扬。经过这样三个多月的不断教育，他提高很快。一次检修炉子，他争先冲进四、五百度高温的炉子里，受到了老师傅的赞扬。

例二：复员军人徐潜，工人家庭出身。一九七一年进厂后不久，被选为团小组长，表现一般。后来他开始讲究穿着，工作自由散漫。去年夏天，他和别的几个青年到附近农田捉蟋蟀，偷吃甜芦粟，当场被社员抓住，徐则溜了回来。后来，社员表示：只要厂里领导来处理，就可以把他们放回。当时，他们怕问题闹大，就相互商定，由徐充当团的领导干部去办交涉，把他们保回来了。后来，车间党支部发觉了这件事，先后召开了两次群众批判会，会上，给徐潜戴上“冒充领导干部”、“破坏工农联盟”两顶帽子。事后，又没有帮助他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指出今后努力的方向。这样，他没有能够正确吸取教训，学习没劲，工作消沉，而且追求穿着的缺点更加发展。许多青年见此情况，也颇多议论，说领导作风粗暴，是“小题大作”。

车间里也有一些干部，以为只要对青年多加表扬，就可以

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工作做好。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往往走向反面，影响了青年的进步。

例如：轧钢操作工郑学栋，进厂时，积极要求进步，工作肯钻，有闯劲。他的缺点是：骄傲自满，听不得批评，有人表扬他，积极性就很高。领导上了解他这个弱点，不但不去帮助他提高，反而一味表扬。一会儿在大会上表扬：“郑学栋带头排除故障”，号召青年向他学习。一会儿又对他父亲说：“你儿子是一块‘纯钢’，只要再捶打几下就可以了。”后来，小郑看到和他同时进厂的青年不少已经入党、入团，他入团的要求更加迫切。开始，他以为入团已经没有问题，但一批一批宣布名单，都没有他的名字，他很苦闷。他听到有人批评他“摆老资格”，以为是当行车指挥吹哨子多了，就不敢多吹哨子，工作上也谨小慎微，不敢大胆负责。回到家里，母亲也怀疑他在厂里表现不好，他难过得说也说不清楚。在车间里也可以听到一些青年对领导这样的意见：批评就是单纯的批评，表扬就是单纯的表扬，缺少一点辩证法。有个青年还说，“我们这些人，好象鸡蛋一样，不是被放在冰箱里，就是被放进汤锅里，怎么能孵得出小鸡来？”

### 三、钢板车间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情况

钢板车间共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二十八人，占车间青工总数的百分之四。他们的父母政治情况是：地、富五人，反革命分子十五人，坏分子七人，右派一人。他们的年龄，最大的二十九岁，最小的十八岁，平均二十二岁半。

这些青年在党的教育下成长，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政治觉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有一定的认识。他们大多数愿意背叛反动家庭，走社会主义道路。两人已经参加共青团，一人担任生产小组长。但大多数又存在着“先天不足”的倒霉思想，抱着政治少过问、工作好好干、免得找麻烦的态度。对自己的前途考虑较多，对入党、入团感到高不可攀。

这二十八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中，政治表现好的和较好的有二人，政治表现一般的有二十二人，政治表现差的有四人。

#### 表现好的和较好的

主要表现在：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能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能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注意世界观的改

造。检验工沈薇薇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她今年二十五岁，六届高中毕业生，曾在崇明农场锻炼三年，一九七一年一月进厂，八月加入共青团。她父亲是混入工人队伍的地主分子。一九六六年初，沈薇薇还在学校读书时，团组织要发展她入团。当时，她听姐姐说，年幼时有人叫她姐姐是“小地主婆”。她听了这个情况，立即向父亲追问来历，她父亲被迫说出了地主身份。沈薇薇经过思想斗争，向组织汇报了真实情况。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红卫兵来抄她的家。她主动配合，将剥削财物抄出交公，并且当晚就搬到学校去住。第二天，还在里弄里贴出揭发父亲剥削罪行的大字报。当父亲被遣送回乡时，她从家里只拿四卷《毛泽东选集》回来。到了农场后，她一度埋怨自己投错了胎，情绪有些消沉。后来，学习了北京“六厂二校”经验，特别是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指示以后，鼓舞极大。从此，她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投入三大革命斗争。当她听到一个批斗对象悄悄地唱什么“盼星星，盼月亮，只盼妈妈救我出火坑”，就面对面地进行了揭发和斗争。不久，她当了基干民兵。有一次，在拉练途中，她当卫生员，为了抢救一个溺水的贫下中农小女孩，口对口地把小女孩食道内的脏物吸出来，受到了贫下中农的称赞。有人问她：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她说：“别人用十倍的努力改造世界观，我要用二十倍的努力！”

## 表现一般的

这部分人有革命的要求，认识到，“先天不足，后天不能失调”。但他们包袱较重，认为：“说话、做事腰杆子不硬，还是老老实实、处处小心为妙”。因此，思想反复较多，进步不显著。这类人数较多，其中又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政治上要求进步，但对反动父母藕断丝连，感情上割不断，思想很矛盾。在工作上往往是忽冷忽热，反复较多，前进步伐不快。

检验工陆一霞就是一个典型。她高中毕业后，先到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一月进厂。她对父母历史上的反革命罪行有一定认识，愿意向组织上暴露思想，也敢于对不良现象开展批评、斗争，学习和工作表现都较好。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写大字报揭发了父母的反革命罪行，但她看到同学们都疏远她，不让她参加红卫兵串连。以后，要求入团，不但得不到鼓励，有人还要她检查入团动机，问她是不是想混进团内？她感到前途都被父母毁了，一度情绪消沉，走在路上，甚至想过还是让车子撞死了事。后来，吸收她参加造反组织，她开始积极起来。在农场时，分配她在炊事班工作，她很高兴。有了进步表现，又受到了表扬。进厂初期，领导上给她做一些工作，拉练途中还当炊事班长，她感到领导上这样信任，工作就更加来劲了。同

时，她也经常想到党对反革命父母的不同处理，对党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陆的父母都是解放前的特务，但母亲表现不好，解放后还攻击党，被管制三年。父亲能坦白交代反动历史，认罪态度较好，没有戴帽，还领退休工资八十多元。这使她认识到：家庭出身虽然不能选择，但个人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有背叛反动家庭，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但是，她对母亲还有感情上的联系，还不能做到一刀两断。去年七月，母亲病重，她难过得掉下眼泪。母亲死时，她想到母亲的反革命罪行，恨她给自己背上一口黑锅，心想：这种人死了跟死一条狗一样。这样，她既不流泪，也不戴孝。上午断气，下午就把尸体送进火葬场，骨灰也不要。可是事后，她又后悔起来，还对人说：“我妈送走时身上还有点热气，我疑心她没有死。”后来，经过组织上对她帮助教育，她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提高了觉悟。沈薇薇入团，她很羡慕，也想争取入团，但想想自己条件不如她，又悲观失望。她就是经常处于这样一种思想矛盾状态之中。

还有一种是工作上勤勤恳恳，但争取进步的信心不足；平时小心翼翼，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检验工邓良芝就是其中的一个。邓父是反动会道门骨干，一九五四年被捕判刑七年，一九六〇年在劳改中病死。母亲是资方代理人。邓初中毕业后，一九六八年分配在崇明农场劳

动，一九七一年一月进厂。她进厂后要求进步，工作负责，读书看报比较认真。但平时沉默寡言，年纪轻轻，活象个小老太婆。据了解，邓良芝在中学读书时很活跃，写过入团报告。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出身不好，不让串连，她想不通，哭过好几次，只怨自己投错了胎。在农场没让她参加基干民兵，她更怨恨是反动父亲害了她。她对人说：“反动家庭出身的污点抹不掉，要象沈薇薇那样又赶不上。想来想去没有办法。”在农场时，她写过入团报告，但放在口袋里，犹豫好多天没有勇气交上去。到了厂里，看到沈薇薇入团，触动很大，想想自己年龄还小，为什么不能争取？当一想到车间还有那么多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年没有入团，又泄了气，不敢提出要求。

### 表现差的

这一类的特点是：与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政治上不要求进步，工作上马马虎虎。

检验工戴佩兰，二十四岁，父亲因贪污，劳改四年，现留场劳动。她于一九六八年到农场，一九七一年一月进厂。她进工厂以后，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不要过问政治，安安稳稳过日子”。她给弟弟写信，也要他“生活多做一点总没有错，闲事要少管，还是太平一点好。”她对老师傅处处奉承，从来不提意见，人前只讲好话。平时开会从不发言，但“工调”评到

原小组长时，她却竭力为这个工人说好话。由于她能够拉拢一部分落后群众，因此，当她工作出了差错，受到组长批评时，有些工人却为她辩护。

## 几个问题

这个车间党组织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做了不少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有不少干部对这部分青年的教育重视不够。有的说：“对出身好的青年工作还做不完，哪里有时间去抓这些人的工作？”有的消极地接受文化大革命前犯错误的教训，不敢接近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担心重犯立场、路线的错误。具体的表现有：

(一) 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关心、不研究，不对他们提出具体的要求。只要他们不犯错误，不出毛病，过得去就行了。根据我们了解，这些青年十分关心领导上对他们的态度。去年八月，沈薇薇被批准入团，在出身不好的青年中震动很大。最近，市委负责同志到厂里开座谈会，让沈薇薇参加，大家也很关心。会上，领导同志对沈说：“你们是党的儿女”，沈十分激动，流下了眼泪。会后，许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都去向沈打听，沈也向她们一个一个地传达，她们听了也激动得流泪，表示要争取上进。这说明，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去做工作，这些青年多数是可以教育好的。

(二) 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敢沾边，不敢培养使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发展沈薇薇入团。事先，团总支已经先后开过三次会，进行讨论，最后一致通过了。但团总支书记签字后，三个晚上未睡好觉。他还对人说：“准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再挨斗。”后来，入团报告送到团委，团委也不敢批，一直等到上级党委表了态，才批准。

(三) 对他们应该怎样使用培养，都没有认真研究。不少同志宁“左”勿右，不敢分配工作给他们做。沈薇薇刚由检验站党支部提名调到车间当广播员时，党总支并未反对，后来了解她家庭出身不好，有些同志就不敢用她了。沈察觉了这个情况，也产生了顾虑，要求回班组，车间领导就来个“顺水推舟”，让沈回工段去了。有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背后议论说，党的政策我们坚决相信，就是不知道基层领导执行得怎么样？

## 四、如何做好犯错误的人的转化工作

二转炉车间在清队、“一打三反”运动中，除揪出个别坏人外，还重点审查了四十七个犯有各种错误的工人和干部。在批判教育帮助之后，分别给予适当的处分或处理。

最近，车间里又新发现有十五人犯有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的错误，其中五人正由专政机关拘留和冲击审查中。

我们重点调查了四十七个运动中审查对象和十五个新发现的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六十二人）的情况。

### 犯错误的情况

按所犯错误的性质来看，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犯政治错误的十四人。其特点是“四多”：出身于反革命家庭或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多，占七人；临时工多，占七人；年纪轻的多，三十岁左右的占九人；有文化的多，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有十一人。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有的出身于反革命家庭，仍坚持反动立场，妄图变天；有的由于剥削阶级家庭受到冲击而不满，进而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的经历复杂，旧意识浓，对现实不满；也有的家属在海外，向往

资产阶级糜烂生活，企图越境。有的出身虽好，造反后忘乎所以，犯了错误；如：贫农出身的陈桂根，在交大附中担任工宣队员时，吃醉了酒，在一次会议上语无伦次，呼出了反动口号，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

第二种，犯经济错误的十六人，其中十人的问题在四清运动中已经暴露，到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清队、“一打三反”运动才结案；六人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查出有经济性质的错误。在这六人之中，惯窃犯四人，其中艺徒占三名。艺徒朱耀杰，七〇届学生，进厂后表现坏，上班跑四室（医务室、更衣室、电视室、冷气室），下班打群架，偷东西。钞票、衣服、油、盐、酱、醋、米、煤球等东西样样都偷，还到医院里偷病假单，骗取长病假。朱曾在公安局三进三出。组织上为了挽救他，曾给予开除出厂、留厂察看一年的处分，一九七三年初又因偷窃，被区民兵指挥部冲击审查。

第三种，犯生活错误的十六人。除三人是一般生活问题外，多数人错误性质严重。有的奸污幼童或哑吧少女；有的干暗娼活动；有的教养释放后，继续犯罪。青工舒祖暖，是地区里的小流氓，持刀强奸回沪探亲的云南插队女青年。这些犯错误的人，民愤一般都比较大大。

第四种，犯其他错误的十六人。如：破坏机器，制造设备事故；开“地下旅馆”，获取非法收入；唆使青年犯罪，坐地

收脏；隐瞒历史，以及严重旷工等等。青工徐天佐，旷工达一百九十多天，党支部书记六次上门做思想工作，小组同志多次登门“请他”，其父也对他进行多次劝导，均无效。

## 目 前 的 表 现

按其目前表现，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好的。这些人对自己的错误有较深刻的认识，在政治学习、生产斗争中表现较好。属于这一类的有十一人。这些人所以会有较大的转变，党组织用政策思想武装群众，发动群众一起做转化工作，是很重要的条件。例如刺铝工袁德福，现年四十岁，从小沾染流氓习气，爱打群架。他与二个哥哥，解放前在杨树浦一带号称“三老虎”。一九五〇年袁由民政局收容，在遣送苏北教养途中逃跑。回沪后，就进上钢一厂，现是六级刺铝工，技术水平较高。长期来，袁恶习不改，动辄打人骂人。四清运动中，审查他从收容所逃跑的一段历史，为此曾批斗二十三次，袁死不认账。文化大革命中，袁上夜班打瞌睡，连续出了两次浇钢事故，报废几十吨钢，还拒绝别人帮助，说什么：“你们送我到提篮桥改造去好了。”在开展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中，经过四十余次大小会议，群众对他进行反复帮助，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他才开始承认错误。以后，精神面貌有变化。现在，车间里领行车缺人，他去，浇钢缺人，他顶，

劳动积极主动。最近在抢救一炉钢的战斗中，他负了伤。在家休养时，还买了一套《列宁选集》，认真阅读。袁德福在转变过程中，思想有过反复，组织上对他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推动他的进步起了重要的作用。有一次他主动去支援其他小组劳动，工段长表扬了他，一部分老师傅不理解，批评领导：“你们执行什么路线，依靠什么人？”受过袁德福打骂的同志还提出：“你们表扬袁德福，是否叫我再给他撕破一件衬衫？”有的干部听到意见后，也有点担心，怕表扬不当，又要犯路线错误。袁德福看到这种情况，很灰心。他想：犯过错误的人，人家瞧不起，太积极了反而惹是非。党组织针对这种情况，举办了专题学习班，围绕犯过严重错误的人有了进步表现该不该表扬的问题，展开大辩论。有些同志原来认为：“过去有罪，现在表现好是应该的，谈不上表扬。”“对犯错误的人，只有管得紧，压得牢，才不会翘尾巴”。通过学习，认识有了提高，曾被袁德福撕破过新衬衫的盛志林说：“我只想到撕破的衬衫，却没有看到人家的进步。”会后，他主动去做袁的工作。党支部副书记高法仁同志，住在医院里，也把袁请去，对袁说：“你不要因为大家有不同看法，产生消极想法。要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相信党，相信群众，抬起头来，继续革命。”车间领导同志还上门访问。组织上的关心，同志们的帮助，使袁深受感动。他体会到，过去大家批判他，是为了帮他改正错



误，现在大家关心他，是为了拉他一起干革命。目前，袁学习认真，工作积极。

第二类，一般的。这部分人对自己错误有初步认识，但由于思想包袱重，表现仍较消沉。这类人较多，有三十六人。有个装包工徐同增，自认为出身好，放松世界观改造，思想觉悟不高。文化大革命中，他参加的一个群众组织被冲击后，一个月不上班，还同一些人联名写大字报，搞什么“绝食斗争”，宣扬什么“临时工生活没保障”等错误言论。在清队、“一打三反”运动中，对群众的批判帮助情绪对立，一再同群众顶嘴。一次，失口呼出反动口号，当场被扭送公安局，扣押审查了六个月。释放后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分配在平板组清垃圾。在劳动中，他思想很矛盾，一方面，他对装包机械化的革新项目很感兴趣（他当过好几年装包工），对知心的人说：“我年纪轻轻，有文化，不可能一辈子出垃圾。”另一方面，又怕别人讽刺。因此，在家里偷偷地搞试验。他自己花钱买橡皮泥，做泥芯，还叫爱人请人代绘机械图。后来，他把设计方案交给领导。但领导上不予理睬，使他很灰心。特别是有一次他上医务室看病量体温时，医生怕他弄虚作假，不给量口腔，要他量腋下。他认为是对他的污辱，跟医生吵了起来，医生当即批评他：“不要翘尾巴。”从此，他下决心不再积极，更不搞技术活。最近，装包子缺人，领导上要他去顶班，他说：“我是戳

破了的皮球，泄了气，宁可一辈子出垃圾算了。”

第三类，差的。这部分人对所犯错误缺乏认识，有的还在重犯。这类人有十五人，数量不多，但影响很坏，领导上对他们也感到缺少办法。青工朱兴国，曾是少年教养所的释放犯，自幼沾染坏习气，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抢大饼油条达百余次，被送去教养。进厂后，领导上发现他经常与一些流氓阿飞鬼混，曾多次举办学习班，由老工人对他教育帮助。但由于不注意下班后对他做工作，有个和他同宿舍的戴帽坏分子董福根拚命拉拢他。结果，白天我们做他工作，晚上，坏分子拉他下水。他在坏分子的教唆下，奸污妇女，走上犯罪道路。目前正在区民兵指挥部里冲击审查中。

## 几个问题

一、落实政策问题。少数同志政策观念不强，不能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例如，工人卞国勋，运动中作为“富农”审查批斗，本人不承认，一度定为富农分子，不戴帽。一九七〇年二月复查时，改定工人成分，但由于卞对原来的定性不戴帽的处理不服，劳动表现不好，群众对他有意见。因而，拖了二年多，乙班支部一直不宣布复查结论。有一次，有个工人酗酒，被送进了派出所。因为卞曾同这个工人一起喝过酒，小组里又专门对他开了批判会，还作为“富农分子”对他进行批

判帮助。又如党员干部黄群，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时，家庭成分是破落地主，一九四六年土改时，家庭成分下降为中农。一九六三年整顿劳保卡，仍将黄母划为破落地主，取消劳保享受。现经查明，黄母土改时的成分确是中农。黄群在审查期间，母病亡，花了很多医药费。他要求报销母亲的最后一笔医药费。但厂里经办人员回答说：“政治上已从宽了，经济上就不必再补发了。”问题至今未解决。

二、对屡教屡犯错误的人的处理问题。对于这种人，大家感到头痛，没办法。青工郑凤凡，一九六〇年因犯生活腐化错误，受到开除出厂、留厂察看一年的处分。最近，郑又重犯生活腐化错误，又给予开除出厂、留厂察看一年的处分。老师傅说：“这种处分对郑凤凡起啥作用？”也有的老师傅说：“开除出厂是吓吓人的，到期表现不好，还是开除不了。”

三、管制问题。目前对宣布管制处理的对象，如何实行管制，政策不明确。奸污幼女犯刘克华，一九七三年一月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管制三年。处分宣布后，群众提出问题：“对管制的坏分子和不管制的坏分子，对他实行专政的措施有啥区别？”有些人解释说：“管制是一种刑事处分。戴上帽子，再进行管制，是对戴帽分子的加重处分”。但厂保卫部门的解释恰好相反。他们说：“宣布管制是给戴帽分子一个‘奔头’，管制期满之后可以重新评审。如果表现好，可考虑摘帽。”

## (二)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

### 一、二纺丙班细纱工段青工学技术情况

### 二、二纺甲班青年女工健康状况的调查

## 一、二纺丙班细纱工段青工学技术情况

### 青工技术状况

二纺车间丙班细纱工段有三十岁以下的挡车女工六十八人，占工段挡车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九。

这些青工分别在三个时期进厂，第一批是一九六四年，第二批是一九六八年，第三批是一九七二年。这三个时期进厂的青工的技术状况有明显不同的特点。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进厂的十四人，其中六人是本厂技工学校毕业，八人没有进过技校，是父母退休顶替进厂的。她们的平均年龄二十九岁，有十二人已结婚。

这十四个青工，二年满师后，曾先后三次进行过操作技术的测定。半工半读学生的成绩一般比顶替进厂的好。第一次测定是在一九六六年评定技术等级时，六个半工半读学生，成绩好的五人，中等一人；八个顶替进厂的，好的一人，中等和差的七人。第二次是一九七二年八月，半工半读学生，好的一人，中等和差的五人；顶替进厂的，好的二人，中等和差的六人。第三次是在一九七三年，半工半读学生，好的三人，中等和差的三人；顶替进厂的，好的一人，中等和差的七人。一九

七二年的一次测定，半工半读学生成绩下降，主要是由于当时有些青工转正评级后，产生了“级别已定局，多钻技术没意思”的思想，干活有点马虎。

二、文化大革命中进厂的四十五人，其中初中毕业生四十人，高中毕业生五人。平均年龄二十四岁，三人已结婚。

这批青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思想政治觉悟较高，干劲足。从这些青年进厂后三次技术测定的情况来看，技术进步也较快。一九七二年八月第一次测定，好的六人，中等十五人，差的二十四人。同年十二月第二次测定，好的增至九人，中等十七人，差的减至十九人。最近一次评定，好的增至十一人，中等增至二十三人，差的则减为十一人。这些青年一般进厂半年即能独立操作，完成定额，其中有三分之一并能落纱、摇车，成为“多面手”。但她们没有学过先进的操作法，而是采用各自的“自由法”，接头常有白点，并且影响操作技术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在气候、用棉等条件发生变化或翻改新品种时，她们缺乏经验，更加应付不了。

三、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进厂的初中毕业生九人。进厂五个月，都能达到生产定额的三分之二。达到这样的水平，比一九六四年进厂的青年要缩短一半时间，操作的正确程度和质量比一九六八年进厂的好。

### 三个时期的不同培训方法

细纱挡车工主要是学习挡车操作技术。三个时期进厂的青工培训方法各不相同。

一九六四年进厂时，先集中学习掐头、包卷、巡回等动作，再分配到班组，分别跟一个老工人边干边学。两个月后独立挡半台车。然后扩大看锭，从半条弄堂、一条弄堂，逐步扩大到两条半弄堂，约一千锭，达到一般挡车工人的定额水平。采用这个培训方法，青工从进厂到达到定额，约需两年时间（因技校实行半工半读，因此，技校毕业的学生，进厂时已有操作实践基础，时间可以缩短）。这种培训方法的优点是，有固定的老工人带，班组有测定员经常测定操作成绩，及时纠正缺点，因此，单项操作动作比较准确，巡回路线合理，质量也较稳定。缺点是培训时间太长。

一九六八年青工进厂时，刚好有四十个老工人退休，十个工人出去当工宣队，工段劳动力一下减少了四分之一，同时，由于生产任务增加，新工人学习班只办了三天，就下到班组学习挡车：第一个星期，由老工人当“小先生”教她们接头、包卷等基本动作。第二个星期，几个人挡半条弄堂，由老工人作指导，边挡车，边练基本动作，这样连续三个星期，到第五个星期，一人挡一条弄堂。然后逐步扩台，一般经过半年时间，

达到工人的一般定额水平。这种培训方法的优点是，在生产实践中学，充分发挥青年接受能力强和敢想敢干敢闯的革命精神，因而时间短，提高快。但缺点是基本动作没有认真练，平时又没有固定的老工人带，操作技术主要靠青工自己钻、自己摸，因而操作动作走样，各搞各的“自由法”，影响产品质量。

一九七二年进厂的青工，工厂领导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前后技术培训的经验，既强调在生产实践中培训，又比较注意系统的技术训练。新工人进厂后，即分配到长日班，边由老工人教基本动作，边上车实习，同时，专门组织她们上技术课，了解、掌握细纱机的结构和性能。一个月后，分配到运转班，由固定的老工人负责指导，开始挡车，逐步扩台，同时，由班组的操作测定员定期测定操作动作，发现缺点，及时纠正。采用这种方法，新工人进厂后，约半年或者半年多一点时间可以达到定额水平。

### 青年工人对学技术的思想和要求

一、有少数青年工人学技术不积极，她们看不起细纱挡车工作，认为：“一天到晚就是接几个头，学不到什么技术。”特别是有些高中毕业的青年，一心想升大学，不愿学操作技术。还有少数青工，开始时学技术还比较认真，等到满师转正

了，工资拿到手，就不大愿意继续钻研技术了。厂里的同志认为，前一时期通过批修，“读书做官论”、“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等修正主义谬论，狠狠批了一通，对推动青工学技术有很大作用，但这种流毒在少数青工中还是存在，因此，开展技术教育工作，一定要加强思想政治路线的教育，提高青工为革命学技术的自觉性。

二、目前工厂对满师后的青工进行技术教育，主要是通过业余学校的形式，进行比较系统的基础技术理论教育，群众也欢迎这项工作。但是，参加业余学校学习的青工只是一部分（我们调查的这个工段有三分之一青工参加），不能密切结合当前生产的需要。我们接触的不少青工已经有这样的反映，她们要求从当前生产实际需要出发，举办讲座，如讲解机器结构、性能，普及技术知识；组织先进工人进行操作技术表演，交流推广先进经验。

## 二、二纺甲班青年女工的健康状况

二纺车间甲班共有女工四百一十九人，其中一九六八年底至一九六九年初进厂的青年女工六十五人，占甲班女工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点一。这些女工，都是六六届、六七届的中学毕业生，内高中十人，初中五十五人。她们分布在前纺、细纱、加工三个工段。平均年龄为二十三点八岁，最大的二十七岁，最小的二十一岁。

### 当前健康状况

这些青年女工与甲班中老年女工相比较，健康状况是好的。我们在甲班前纺、细纱、加工三个工段各抽一个小组（都是第六组），对青年女工和中老年女工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二年的缺勤率作了统计，发现中老年女工的平均缺勤率比这些青年女工高一倍至三倍（青年女工逐年平均缺勤率为十四点三天、十点八天、十七点一天、十九点九天；中老年女工则为三十九点七天、四十一天、四十三点一天、四十点三天。）

六十五名青年女工的健康状况，大致可以分以下四类：

1、身强体壮，能胜任本职工作的二十三人，占百分之三十五点四。如前纺钢丝挡车工朱毛毛，饭量大，睡眠足，干活

不知累。

2、体质较好，疾病不多，能正常工作的二十四人，占百分之三十六点八。如细纱挡车工周惠明，虽有痛经、突然心跳等疾病，但体质尚好，下班后注意休息，不影响工作，前四年每年平均缺勤只有七天。

3、体质较差，有较多或较重的慢性病，劳动时体力常感不支的十人，占百分之十五点四。如细纱挡车工张帼英，患有心脏额外收缩，心跳很快，并有严重神经衰弱，夜班下班后吃安眠药也只能睡五小时，前四年每年平均缺勤十七天半。

4、体弱多病，难以胜任本职工作的八人，占百分之十二点二。如加工挡车工曹启华，体质差，有尿道感染、肾炎、胃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不能坚持经常工作，前四年每年平均缺勤七十八天半。

以上四类中，好的和较好的四十七人，占这些青年女工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较差和差的十八人，占百分之二十八。

### 部分青年女工体质下降

进厂四年来，部分青年女工健康水平显著下降。目前患有下列疾病的有三十七人：胃溃疡三人，神经衰弱十人，尿道感染四人，坐骨神经痛三人，心悸十一人，高血压二人，肝肿四人。其中患有两种疾病的十二人，三种疾病的三人，四种疾病

的两人。与进厂时比较，六十五人中体质明显下降的有十八人，占百分之二十七点六。其中，身体好的由进厂时的三十二人下降为二十三人，差的由进厂时的四人上升为八人。

好的降为较好的九人。冯小妹，进厂前身体很好，是学校的田径运动员。进厂后开始心悸，一九七一年下半年肝肿大低热，今年一月得了关节炎。降为较差的一人。前纺钢丝挡车工陈秀娣，进厂前身体很好，喜欢打篮球、游泳，没有慢性病。进厂后于一九七〇年得了严重坐骨神经痛，请了八个月病假。

较好的降为较差的四人。加工挡车工张华敏，进厂时除患有慢性扁桃腺炎外，没有其他疾病。进厂后体重下降，先后害过肾脏病、腥红热、慢性咽喉炎。现在睡眠不好，饭吃不下，工作没有精神，碰到生产任务加重时，体力就难以支持。降为差的一人。加工挡车工王月娣，进厂前体质较好。进厂两三个星期就心动过速，一九七一年血小板减少，失眠，做夜班恶心头昏。

较差的降为差的三人。加工挡车工胡珍芬，进厂前就有神经衰弱，体质较差。进厂不久就胃痛、肝肿，后又支气管扩张出血。一九七一年发生肠粘连，严重便秘。下班后浑身疼痛，难以坚持工作。

这些青年女工是车间前纺、细纱、加工三个工段挡车的主要力量，由于健康水平下降，缺勤率逐年上升，有时造成关车

停产，给生产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 健康水平下降的原因

部分青年女工健康水平下降，主要有如下几种原因：

一、进厂前的体质本来就较差。有些学校在分配毕业生时，认为纺织厂工作较轻，把一些体质较弱的同学分配到纺织厂。这些学生进厂后，做了运转班，睡眠、吃饭等生活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上劳动比较紧张，身体就不适应。据厂劳动部门统计，在全厂七百多名同时进厂的青工中，进厂两个月后患有各种较严重的疾病或发现身体有缺陷的有七十七人。分配在二纺甲班的六十五名青年女工中，有较严重疾病或身体有缺陷不适应所分配的工作的有七人（后调走一个），占百分之十一。

二、厂里的机械设备大部分是二十年代初期的，较新的也是四十年代的产品，只有少数是解放后添置的，自动化程度不高，劳动强度较高。前纺工段钢丝工序一个女工要挡十台车，三十分钟落筒一次，一筒生条二十四市斤。每班约落一百五十筒，搬动生条三千六百斤。同时大揩车三次，小揩车十五次，出脚花两次。这些工作都比较笨重，体力消耗很大。细纱挡车工要看三条“弄堂”、一千二百四十八个纱锭。每班换粗纱二百九十八只，接头八百多根，约走十五至二十里路。加工的设

备工艺是三个工段中最原始的工段，工作也最紧张，除小机接头外，其他都是手工操作。每班要接头三千四百根左右。细纱、加工都是连续操作，除吃饭关车半小时外，要手脚不停地工作，中间没有间歇，生产一紧张，连大小便都没空去。女工普遍反映说：“纺织行业真是轻工业不轻。”

同时，机器转速提高后，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也增加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如细纱工段为了提高单机产量，加快了车速。三十二支纱，解放初每分钟一百七十转，大跃进后二百五十转，现在是三百二十转。加速后机械、操作等技术措施跟不上，工作难度大，断头率高，女工的劳动强度也相应增强了。女工普遍反映，碰到生产难做，断头多时，心里就发急，思想很紧张，围着机器奔跑。青工周介华曾在难车上挡车，断头多，工作紧张，连有人站在身后都不知道，下班后发现手上碰伤了几处，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碰伤的。这个工段由于车速加快，劳动强度高，工作紧张，有的青年女工食欲不振；有的得了失眠、胃病、心悸、高血压、尿道感染等疾病，有的体重锐减，如邵春花、吴惠香、周介华等，进厂后体重都下降了二十斤左右。

三、过早顶岗位，工作安排不当。这些青年女工进厂后，学了几个月，技术还不熟练，体力还不适应，就独立顶车位，当上了工作难度大、操作紧张的挡车工，少数人就较快地出现

了体质下降的情况。

有的青年女工本来有某些疾病或身体有缺陷，由于工作分配不适宜，也造成了体质下降。前纺钢丝挡车工谭永美，原有轻度美尼尔氏综合症，不适合所分配的工作，一九七〇年发展到昏倒休克。不久，又得了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吐血拉血，经常饭吃不下，睡眠不好，浑身疼痛，做夜班就头昏、恶心，工作做不动。

四、部分青年女工住家离厂较远，或者家务重，影响了休息。在六十五人中，住虹口区的三十二人，南市区的十七人，黄浦区的四人，闸北区的二人，卢湾区的一人，浦东地区的一人，住在工厂所在地杨浦区的只有七人。上下班途中一般要一至二小时，远的要三小时以上。如曹启华家住中山南二路，每天来回要三小时以上。她本来体质就较差，工作又较紧张，加上路上奔波，身体越来越差，现在只能早班做三、四天，中班做二、三天，夜班几乎不能做。

有的居住条件较差，家务较繁重。如吴珍芬，全家七口，住房只有十二多平方米（有一间是灶披间），家里又有人生病，需要照顾，因此，在家不能很好休息，体质越来越差，缺勤率逐年上升：一九七〇年十三天，一九七一年二十天半，一九七二年五十三天。

此外有些女工早谈恋爱、早结婚，不能正确处理个人生活

问题，也影响了身体健康。

### 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革新技术，减轻女工劳动强度。前纺钢丝挡车工，出脚花时又累又脏，带两个口罩操作，飞花还是吸进呼吸道，工人普遍要求安置地下吸尘器。这个要求已提出多年，上棉五厂已有这种设备，花钱也不多，而对于保护女工健康，防止气管炎等疾病却很有作用。粗纱工人要求用皮带自动输送落好的粗纱，代替人工捐纱。加工挡车工建议采用别厂的办法，座椅改为能坐能站，座位夏天改用藤条或草席。

二、利用厂里现有条件，积极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如前纺钢丝挡车工朱毛毛，长期坚持业余体育活动，身体一直很好。有的女工也说：“生活虽然紧张，但只要注意锻炼身体，保证必要的休息，就能有充分的精力做好本职工作。”青年女工中有很多人以前在学校时就是文娱体育积极分子，可以以她们为骨干，把车间里的文娱体育活动广泛开展起来。

三、加强医疗保健工作，改善生活条件。女工普遍反映食堂离车间太远。冬天车间温度经常在摄氏二十五度左右，工人穿着单衣单裤工作，而室外却经常在零度左右，有时还刮风下雨。吃饭时工人都是裹件旧棉袄就上食堂，经常受冷感冒，易得风湿性关节炎。工人迫切要求造一座天桥，由车间直通食



堂。

四、劳动部门在分配青年学生进厂时，应尽可能按区分配。新工人进厂后，也要根据她们健康情况分配适当工作。学徒期间，不要急于顶岗位，应在她们掌握了必要的生产技术，体力比较适应时，才顶岗位独立挡车。对目前由于有严重疾病或身体有缺陷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少数青年女工，要适当调整

工作。